

中国基础教育评论

第①辑



刘铁芳 主编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基础教育评论

第①辑



刘铁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基础教育评论 第1辑 / 刘铁芳主编. —上海
: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32-1995-3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基础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3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172258号

责任编辑 顾 悅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工作室 储平

中国基础教育评论(第1辑)

刘铁芳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14986
市场部热线 021-63149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06,000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
ISBN 978-7-5432-1995-3/G · 671
定 价 30.00 元

主编的话

从“关关雎鸠”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先民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优美的诗歌，更是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充满劳碌却不失优雅地生存在农历的天空下。当时光流转，我们已然迈向现代化的深处。对于物质发展和速度的迷恋，让我们淡忘了古典的质朴与优雅。辑刊开篇主题“古典诗教的意味”编入4篇文章，钱理群先生的《让诗歌伴随一生——〈诗歌读本〉总序》，立足生涯发展来看诗歌教育的重要性；刘绪义和孙丽娟的《古典诗教的贵族精神》意在重温《诗经》所蕴含的精神气象；陈文芳的《教育与身体共在一——孔子诗教导论》则说明了素以礼教见长的孔子，其内在的支撑正是诗教；余小茅的《保卫教育的古典气质》则直面教育的浮躁现象，意在以古典精神含蕴教育。重申古典诗教传统，一是重温诗教作为教育的初始形式，以激活教育空间；二是诗教原本就孕育着爱与美的人生，重温诗教传统，意在激活教育向着爱与美的生活世界的回归，以焕发诗性精神。

如果说古典诗教是面向古典传统，那么公民教育则是面向现时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主题。王小庆的《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试图重温故纸堆，发掘、整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资源；李伟言的《班级生活的反思与重建》则是从学校生活的微观视角阐释公民教育的可能性。公民教育的主题绝非两篇文章所能概括，这两篇文章仅仅是开个头。

李庆明的《都市田园课程：通向儿童的回家之路》是其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实验学校的都市田园教育实践的纲领性文字。刘发建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小学语文教坛新秀，《亲近鲁迅，温暖生命——“鲁迅启蒙教育”的实践与思考》是其小学鲁迅作品教学研究与实践的概括提升。两篇文章，一篇从学校出发，一篇从学科出发，都是当前基础教育深度实践的成果表达。傅国涌的《老中学的传统》、刘良华的《生命教育哲学视野中的儿童教育》是富于现场感的演讲整理，在勾勒历史、直面人生困境的过程中，阐释当下基础教育的幽微主题。许锡良的《小学才是最重要的》、谢英娜的《迟开的花儿》、刘云杉的《一个蛋头，又一个蛋头》，都是很有教育意趣的小文章，意在唤起一线教师的自我教育生活关注。

目 录

【古典诗教的意味】

- 2 让诗歌伴随一生——《诗歌读本》总序 / 钱理群
- 8 古典诗教的贵族精神 / 刘绪义 孙丽娟
- 20 教育与身体共在——孔子诗教导论 / 陈文芳
- 41 保卫教育的古典气质 / 余小茅

【公民教育】

- 50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 王小庆
- 67 班级生活的反思与重建 / 李伟言

【教育现场】

- 94 都市田园课程：通向儿童的回家之路——学校课程校本化
开发与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 李庆明
- 144 亲近鲁迅，温暖生命——“鲁迅启蒙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 刘发建

【教育讲演】

- 156 老中学的传统 / 傅国涌
- 163 生命教育哲学视野中的儿童教育 / 刘良华

古典诗教的意味

让诗歌伴随一生

——《诗歌读本》总序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奉献给读者的这套《诗歌读本》共分六卷：《天籁之声——学前（出生—6岁）卷》，《成长之歌——小学（7—12岁）卷》，《生命幻想曲——初中（13—15岁）卷》，《心中的诗——高中（16—18岁）卷》，《诗道寻踪——大学（19—22岁）卷》（此卷读者可含大学毕业以后的青年、中年人），《憩息诗乡——老人（60岁以后）、儿童（7—12岁）合卷》。

读者不难看出我们的“雄心”：《诗歌读本》的对象涵盖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我们的编辑理念是：“让诗歌伴随你一生。”

读者自然要问：你们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书？你们如何编这套书？

我们的编辑灵感，来自中国的“诗教”传统。其实，不仅是中国，世界许多民族，特别是希腊、印度这样的古老民族，都有一个诗教传统。

所谓“诗教”，按我们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从大的方面说，也是更接近本义的，就是要以诗来管理、教化社会，以诗治国。这就是《诗大序》所说的“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于诗”。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治国理念，即对人心、民心、民情的重视，观人心、民心、民情的最好途径就是听其声，所以又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之说。这就是所谓“诗可以观”的功能。按儒家的理念，诗的最大功能还是对人的精神的引导、教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也就是要通过诗歌的吟诵，发泄不满和悲苦，使情绪得以平复（“诗可以怨”），然后，通过诗的移情、潜移默化的作用，涵养人的中和之性情（“诗

可以兴”),由个人心灵的净化、性情的温柔敦厚,进而发展为人与人关系的融合,弥漫于家庭、社会以至于国家,就可以达到天下的长治久安与和谐(“诗可以群”)。

对这样的儒家的以诗治国观,历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也有尖锐的批评,这里不予讨论。我们注重的是,其中至少有一个合理因素,即对人的心性、内在精神世界以及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强调诗歌对提升、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及移风易俗的作用。由此,我们想起了人们已经熟知的“人诗意地栖居”的理念,这样的联想大概是有道理的。

一位中学老师对这一理念作了这样的阐述:“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首先,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但这绝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每一个人还拥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是一个诗意的世界。”这位老师说,“为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阅读诗歌的“第一条理由”。

我们提出“让诗歌伴随你一生”的理念,最基本的意义是,在不间断的诗歌阅读中,人将永远保持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永远保持不断提升和净化自我心灵的态势,这确实是一个人“一生”的生命命题,也是我们面对假、恶、丑,必须坚守的最后的人生底线。

我们不仅自己读,还要和朋友一起读,至少要和自己的孩子、家人一起读,这样,我们不仅有充满诗意的生命个体,还有读诗、写诗的家庭和读诗、写诗的朋友圈。在这样一个无诗的时代里,坚守一种诗的个体与群体的“存在”,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首“诗”、一种意义。我们编选这一套《诗歌读本》,也是为了创造一个由编者、出版者、读者共同组成的诗的精神共同体,至少在我们拿起这套书时,能够感受到一点诗意,感受到现实中所稀缺,因而不免有些怪异,但却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美好的诗歌及美好人生的“存在”,这就够了。

“诗教”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重视和强调诗歌在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这也是诗歌教化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首先是基于诗歌和儿童、青少年本原性的亲和力及诗与童心的内在契合。如一位儿童文学研究者所说:“人天生即具备歌唱的本能……在声音与节奏、韵律与情感之间,儿童天生地即与诗有一种最亲密的联系。”诗的创造“植根于这种原初的、天才的想象力和本质性的儿童精神生活中”。如一位中学老师所说:“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段诗意盎然的岁月,那是多愁善感、混沌初开的青春期,迷惘执着的深情、敏感纤细的心灵,仿佛只有诗歌才能诉说满腹的心思,书写对生活的最初感应,因而,每个年轻人天生地就是诗人。”

于是,就有了阅读诗歌的第二条理由:“诗歌是教育,而且是最好的教育,它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诗歌是诗人灵魂的产物，灵魂的交谈方式是最能抵达根本的交流方式。”而且，诗歌能够使我们获得对世界最好的理解。

而儿童教育学者们更看重诗歌的两个教育功能：首先，诗教“不仅适合儿童的天性”，而且“有助于激活（孩子自身潜在的）人类本原的精神自由与想象力”，而儿童心灵自由的保护与培育，又是人的“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件”，这对儿童个体生命的终身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健全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其次，诗教有助于儿童建立个人与古典文明或民族思想文化价值传统，以及人类文明传统之间的亲和联系。这也是由诗歌的本性、本质所决定的：诗在文学的文类中是最具精神性的。因此，杰出的、伟大的诗人的诗，总是集中了时代的个体精神、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读诗，特别是经典诗歌，是承接民族和人类文明精神成果的最佳途径。编选中国和世界最出色的诗歌，促进文明的传承，正是我们这套《诗歌读本》的一个重要动因和目的。

这当然也是有感而为。正值诗意图年龄的儿童、青少年却不读诗，他们的生活也了无诗意，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教育现实。究其原因，首先是在应试教育的狂澜下，诗歌也以应试的面目出现，那种非生命形态，是肢解后的残句片语，接受着一种指令性的观赏”，知识的灌输、解剖式的分析，使得最应亲近诗的孩子望诗而生畏（原珠海一中老师曾宏燕语）。

对诗的挑战还来自电影、电视、动画。如研究者所分析的，“对于儿童来说，生命经验有限，观看动画艺术自然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但电影、电视、动画的想象是“直接的、确定的、图像化的，它具有一种特别的强制性，即让接受者没有自我创造和自我独立想象的空间，只有被动接受和感知的自由”，因此，“我们如果只重视动画艺术，那么，很可能全世界儿童的想象力将来都是一样的”。这就导致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果：“儿童的精神想象没有了自由和无限的可能性。”这样，通过诗歌的阅读来保护儿童的自由想象力和个人创造力，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可惜，中国的教育界和诗歌界，至今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诗与视觉艺术本质上对抗性，还不懂得，越是面对教育手段的科技化，恢复诗教传统就越具有迫切性。我们编辑这套《诗歌读本》，为“诗教”而大声疾呼，实在是出于诗歌教育因应试、视觉艺术的冲击而被边缘化的隐忧。

但我们也有自己有限的信心，还是基于前面所说的诗歌与人，特别是儿童、青少年本原、本质上的血缘关系，即所谓“人在，诗在；青春永在，诗永生”。我们甚至觉得，教育的所有领域：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至于大学教育、成年教育、老年教育，都是诗歌“展翅飞翔”的广阔天地。这些年来，诗歌界一直在

讨论如何走出只有诗人读诗的小圈子和困境，却很少注意到诗教给诗歌发展和传播带来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诗歌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诗歌能否进入年轻一代的精神生活。因此，编选这套《诗歌读本》，也是一次沟通诗歌界与教育界、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的自觉努力，因此，请来了诗歌研究的专家洪子诚教授和我共同担任主编。本书的编者也大都是诗人和诗歌研究者，这样，也就同时增强了这套《诗歌读本》的学术含量。

我们确实是把《诗歌读本》的编选当做学术工作来做的。这就说到了我们“如何编”，即按照什么原则来编选，其理论依据是什么的问题。大体有两大依据和原则。

我在编辑工作一开始就提出，人类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的人类学基本原理，是我们编选这套《诗歌读本》的理论基础^[1]。我们强调，人对诗歌的阅读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在生命成长的不同时期（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和诗歌发生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诗歌阅读需求和期待。因此，我们要根据人的生命成长、心理发展的不同程序来编读本，在人生命和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诗教要求，也就有不同的选文与编排。

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编辑思路，将全书分为以下六卷：

学前卷。分两个阶段：从出生到进幼儿园之间的诗歌，是父母吟唱给孩子听的，是所谓的“母歌”。其特点是诗教与乐教的统一，突出的是“歌”的特点，只为好听，意义并不重要。孩子在聆听、歌唱中学习母语，培养孩子的听觉思维，在听中感悟生命的欢乐、自由和神秘。从孩子进幼儿园开始，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群体，进入了“儿戏”阶段。其最大特点是群体的歌、舞、诗、画的统一，是更接近原始艺术的。我们在这一卷里编选的“游戏歌”、“问答歌”、“数字歌”、“连锁调”、“谜语歌”、“拗口令”、“颠倒歌”等儿歌，都有这样的特点。这一时期诗教的主要功能是，在语言游戏中培育孩子对语言（特别是语音）的感觉与趣味，对五官，特别是听觉、视觉、躯体的感觉，培育孩子的自由想象力。

小学卷。和学前相比，这一阶段的诗教有三大特点：一是直接面对文本，逐渐和歌、舞、画分离，成为独立的文字阅读；二是由群体的游戏性阅读变成个体的阅读行为；三是除声音层面外，开始注意诗歌的意义层面。因此，本卷的编选突出的是“儿童的思维”、“儿童的情感”、“儿童的生活”（包括儿童的家庭和集体生活以及儿童在大自然中的生活），“儿童的智慧与德行”等，其功能是培育童心、童趣、童思、性情、情感、智力和品德的全面发展。

本卷虽不分初小和高小，但特地编选了主要供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的《少男少

女的歌唱》和《祖国土》两个单元，突出“成长”的主题，表现少年意气和精神，并引导孩子的视野由家庭、学校扩展到祖国与世界。本卷诗歌的诗体更加丰富，除儿童诗之外，还有童话诗、寓言诗、哲理诗等。

初中卷。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感觉最敏锐、情感最丰富、想象最活跃、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心理变化最大的时期。为了适应这样的成长特点，我们将本卷的诗歌定位为“生命幻想曲”，以生命母题组织单元，展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他人、社会以及历史的关系，这都是少年期最基本的生命命题。所选的诗歌大都充满浪漫主义激情、丰盛、不羁的想象，并且充溢着生命的亮色，这是为孩子一生的精神成长垫底的。

少年也是诗的自觉意识觉醒的时期。为此，我们特地组织了诗的要素单元，对每首诗都作了详尽的导读，引导学生鉴赏诗歌，并撰写了介绍诗歌基本知识的专题，同时引导孩子自己朗读诗，写诗。

高中卷。学生从少年逐步走向青年，思想、感情都趋于复杂，这是接触“现代诗”的最佳时期。因此，本卷以现代诗的阅读与鉴赏为中心，分别展示现代诗的多义性、风格和抒情方式的多样性以及现代诗的结构和层次。除导读之外，还编选了有关的分析、讨论文章，以引导学生对诗歌的理解逐渐进入诗学的层面，在感性的激发之外，也多一些理性的沉思。

大学卷。大学和大学以后阶段的诗歌读者，大都本身就是诗人或诗歌研究者，他们对诗歌有一种迷恋和探索热情，因此，本卷的定位是“诗道寻踪”。从表面上看，似乎更偏向于对“诗”本身的理性思考，所展现的是“诗歌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及诗歌文化的多个侧面”。但诗的背后，仍有人和人的精神世界；诗学所要追问的，最终是诗道和人之道。它涉及精神与身体、个体和社会及历史，语言和人的思维、古与今、中与西以至于纯与不纯、小与大、自由与规范、少数与多数等等社会、历史、美学、哲学问题。如本卷编者所说：“读一首诗，同时也是接近一种生活方式和想象方式；理解诗歌的目的，最终在于理解自我，理解那洋溢在语言之中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创造力。”这样，对诗的理解又回到最初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与创造，这也是诗教的本质。

老人、儿童合卷。这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合题：老人与儿童相遇。这也是诗教的一个合题：老人和孩子一起读诗。本卷命名为“憩息诗乡”，诗分“天道”、“人心”、“童心、童趣”三篇，而且全选中国古典诗词，这都有返元、归根之意。

这样，本书的编选也就此画了一个圆圈。

这套《诗歌读本》编选的第二个原则，是追求“家庭诗教”、“学校诗教”、“社

会诗教”的合一。因此，本书定位为这三类诗教的阅读读本，它的预设读者是家庭的祖、父、孙三辈人，学校老师与学生以及社会上热爱诗歌的老、中、青三代人。

我们特别注重的是家庭诗教。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教育问题，却又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家庭诗教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家庭营造一个浓郁的诗性空间，让亲情在诗中得到升华。研究者甚至说：“当每个家庭都自由地传出诵诗声与音乐声时，中国的现代文明就会产生真正的变化。”《诗歌读本》编选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要为家庭诗教提供一个切实可用的文本、具体可操作的途径。我们设想，家庭诗教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一生的阅读。学前阶段，以“母教”为主，或由母亲（或父亲）给孩子吟诵诗歌，或父母和孩子一起玩“儿戏”，在游戏中读儿歌。小学（尤其是初小阶段）及部分的初中阶段，由家长和孩子一起读诗，家长给予适当的讲解。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的诗教，应以孩子的自主阅读为主，但家长也要自己读诗，这既是自我精神提升的需要，而且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诗，交换彼此的阅读体会。这应是父母和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进行精神交流的一个较好的方式，在这一时期，孩子和父母的交流常有障碍，一起讨论诗是最好的沟通方式。最后，是老年的祖父母和幼年的孙子、孙女一起读诗，这既是彼此的精神需要，也是沟通祖、孙辈的较好途径。

这样，诗歌就真的伴随我们一生的健康成长，伴随我们家庭的健全发展了！其乐何如，其乐何如！

【注释】

[1] 详见《〈诗歌读本〉编选杂想》，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古典诗教的贵族精神

刘绪义

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孙丽娟

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周公和孔子是 2000 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先知、使者。周公，即周公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境）而得名“周公”，是西周初期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辅助成王摄政，为周王室鼎立天下立下了重大功勋，对于建立和完善周代的封建制度有很大贡献，后世尊他为先贤，奉其为圣人。周公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制礼作乐，用礼乐精神来教化人民，培育了西周“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质，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治国思想，从此，人的地位得以迅速上升，人为神之主。不仅平民和奴隶的命运大幅改观，而且贵族士大夫间都流传着一股浓厚的道德观念，一种绵延 500 年的贵族精神得以确立。

春秋时期的孔子非常崇尚周公的为政，他从小就学习西周流传下来的六艺知识，掌握了西周的典章制度。他对西周的政治制度非常尊崇，认为西周社会是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周公也成为他心目中最向往的人物，以至于常常梦到周公。今天，如陈来等人都已认识到，没有周公，孔子的出现难以想象。

孔子秉承周公，虽然史上说他“述而不作”，但在“述”的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孔子赋予周公传统以新的生命。周公制礼乐，礼是一种宗法制度，乐则是一种教育制度，本意就是为了丰富贵族的修养，培养贵族的道德精神。孔子则大力倡导君子人格，通过行忠恕、修《诗》、《书》、正雅乐、作《春秋》、教弟子，不论出身，都希望弟子们能入则行孝弟，出则得干禄，拥有一种躬行礼乐的贵族（君子）精神，

以期恢复周公之道。

如今，贵族已如“落花”，寻之不易；诗教有如“芳草”，解之更难。本文试图从零落成泥的落花迹中觅得贵族的踪影，在千年之后的芳草丛里解知诗教的奥秘。

一、修辞与敬身

继周公之后，孔子对诗教高度重视。经历多年的游说奔波之后，孔子退而修《诗》、《书》，并开坛授徒，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与诗教紧密相关。而其中，“言语”科与诗教关系最为突出。后世以为，“言语”科就是耍嘴皮子、练口才，其实大谬。所谓“言语”，依刘宝楠引《毛诗传》的解释，就是“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此九者，皆是辞命，亦皆是言语”^[1]。能在此九个方面施命达辞，不仅要有高深的修养，还得有应变的思维，不光是一个口才了得。

《荀子·非相》中说：“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之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2]荀子对君子“赠人以言”、“观人以言”、“听人之言”的重视，反映了言语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言语之别已然成为君子和鄙夫的区别，体现出一个人的高雅与庸俗的区别。

经过周公的兴礼作乐之后，作为一个有修养的贵族或君子，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好的语言表达，而且在政事、外交、军事、指挥等各方面都要有很好的语言修养。它已经涵养于贵族或君子的内心，传达出一种高贵、文雅的精神风范。他们发言成诗，出口成章，表现出一种“郁乎文哉”的礼文。这有点像许纪霖先生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脱口而出：‘对不起，先生。’”这是平时自然形成的礼貌习惯，也是贵族精神的一种表现。

鲁哀公对孔子说：“请问，什么是敬身？”孔子这么回答：“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这段话载于《礼记·哀公问》，表达了孔子“修辞”与“敬身”一致的命题。“修辞”是培育一个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全部特质。敬身是养成君子的初阶，养成君子又是成贤（贵族）立德的初阶。孔子反复强调言辞要有物有伦，诚信合德，得体合礼，谦恭谨慎，要求弟子们通过对象征精神层次的言语的习得而提升自身，使自己在礼文

的内化中完成君子角色的塑造。因而，孔子认为，修辞就是敬身。

《周易·乾卦·文言传》说：“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3]孔子把进德与修辞并举，前者为修业之本，后者为居业之本，可见，孔子把修辞看得比进德还要高一个层次。

作为贵族，要正定号令，就首先必须坚持慎言的原则。其次，言要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要达，言要雅（“不学诗，无以言”），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技巧问题，还是礼文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讲？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4]不言，谁知其志？无文，传之不远。传之不远，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无文”之言，传布范围相当有限；二是指“无文”之言，不会传播后世。

孔子如何落实“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呢？无他，仍然秉承着西周时的诗教。《尚书·尧典》：“诗言志。”这一传统诗教持续到整个春秋，并绵延至战国和西汉，如《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通过诗教来达到修辞居业，是孔子教育的重要方式。他突出了两个关键词，一是“修辞立其诚”之“诚”字；一是“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之“达”字。

何谓“诚”？诚是内心的一种实在、真信，相当于“质”；何谓“达”？达是辞命表达的明确、通达，相当于“文”。钱大昕说：“三代之世，诸侯以邦交为重，论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称之，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则讥之。此辞即专对之辞也。《公羊传》：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辞。《聘礼记》（《仪礼》的一篇）：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5]这里的“文”显然不是文饰，而是对“质（诚）”的准确表达。“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故，孔子提出“三恶”：“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6]三者之中有“二恶”涉及了言和声，都是指不合乎礼文的言语。

诗教作为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教化活动，孔子其时的诗教内容有哪些呢？《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了西周春秋时教育的内容：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7]

“成均”是周代的大学名，现在的韩国仍然有成均馆大学。它和辟雍、上庠、

东序（又称“东胶”）、瞽宗构成“五学”。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有乐德、乐语和乐舞，其中，乐语的载体就是诗歌。从这里可以看到，诗教是与乐教相融合的。

“兴”是起兴，是感发意志的审美体验的初步；“道”训导，言古以剖今；倍（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说文》云：讽，诵也；诵，讽也。发端为言，答述曰“语”。合起来就是乐语（即诗教）。

那么，诗教是如何来实施教学的呢？

第一步：讽诵（即“风”）。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讽诵是诗教的初阶，因此，孔子说，仅能背诵诗三百，却辞命不达，专对不能，那又有什么用呢？不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一步是贵族弟子诗教不可缺少的。

第二步：赋诗（展诗）。选中《诗经》中某一二诗章赋诗专对。赋诗在春秋时期已经蔚然成风。《左传》、《国语》有着大量的赋诗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叔孙穆子为齐庆封赋《相鼠》，庆封不知；次年，穆子降低标准，使乐工为之诵《茅鸱》。或许，春秋时期的贵族只有齐国的庆封、宋国的华定二人不叡此道。^[8]赋诗比讽诵难度大得多。因为赋诗必须坚持“歌诗必类”的原则，要会“引譬连类，托事于物”，赋诗者要对诗进行重新解释或赋义，能够由具体的一人一事一物联想到诗义、诗句。如隐公三年，君子因毛、菜、器、水联想而及《召南·采繁》、《采苹》。赋诗者，要借《诗经》这个文本寄托情志；听赋者，要从《诗经》的微言中发掘大义，所谓“微言相感”。

《汉志》记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9]

“登高能赋”可以位列大夫，是周文之制。可见，诗教中的赋诗就在于培养贵族弟子修辞、敬身的人格和能力。能够因物动志，造辞义之端绪；能够出使专对，微言相感，称诗言志。

“三复白圭”可以妻人，是孔子之为。“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10]白圭之诗出于《大雅·抑篇》：“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宫适所三复者即为此诗。孔子在别的场合还曾称许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11]。足见孔子所以器重他，把侄女许配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能诵白圭之诗，而是因为他在深会诗意之余，犹能凭诗意导正其行。由此可见，孔子承续周文而以诗教，颇重诵诗，而诵诗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格和气质。

第三步：比兴。比兴是“六义”之二，比是比喻，兴是寄托。比兴并非漫无边

际的比附和寄托，而是为了达政、专对。达政、专对，就是使为政者知所鉴戒。贵族子弟诗教的目的，就是为将来从政和出使培养人才。受过诗教的贵族，也自然地被赋予了社会期待和自我期许，否则就会被归入“不肖”一类。

第四步：颂。颂就是祭祀。“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祭祀是贵族统治者的专有权力，威仪三千，歌功颂德，弦诗舞诗，其境界又高于达政和专对。

可见，太师教诗，弟子学诗，都不是为了作诗，而是为了用诗。^[12]“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不是赤裸裸的指责和攻击。可见，用诗也就是修辞、敬身，从而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

自孔子之后，诗教对于人格培养的效果进一步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唐朝时，专门设立“成均监”（即国子监），用以培养贵族弟子。开科取士，重视诗赋，由是养成了诗意盎然的盛唐气象。后世诗人、诗论家对写诗诵诗的认识，给人的启示更加鲜明。如嵇康说：“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而声之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13]越是意境深渺的音乐，就越需要欣赏者借助想象的力量，增强审美感知，升华人格精神，循声律节奏可以领悟诗中的情感与神气，品味诗中的意境，感受诗中那无穷的韵致。这种欣赏过程，正是和悦情感、自我提升审美精神的过程。《文心雕龙·声律》也说：“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字句气力，穷于和韵。”^[14]声律表达情感节奏可以通过吟咏慢慢品味出来，而诗的意境、滋味则寄托于字句，格调、气力呈现于韵节之中。

可见，诗教的功用主要有两点：一是澄净心灵神气。“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15]二是启悟知觉与想象。一行先生引施特劳斯的话并发挥道：“正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我们只有经常理解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才能发挥我们的理解力。这种理解除了提升你们的判断力和精神品级之外，也将使你们获得人生转折关头的决断能力——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可以用理性计算的方法进行比较，而在这种难以取舍和选择的时刻，那种从对自身心性和才能的认知而来的判断力将赋予你们一种精神性的直觉和预感，由此作出的决定将开启和规定你们一生的命运。”^[16]诗教赋予的正是这种启悟知觉（判断）和想象（预感）的能力。

二、《诗经》与贵族

在人类追求文明与进步的道路上，《诗经》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司马迁就说：